实理与体用:朱子体用观再思

赵 金 刚

(清华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089)

摘　要: 体用是中国哲学最重要、最具特色的范畴之一,古来即充满争论。朱子之体用思想颇为复杂,亦可反映理学家使用体用范畴之特色。如何全面理解朱子的体用论,涉及佛教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从此出发,回到朱子思想内部的形上与形下之别,可以通贯的理解朱子的体用思想。朱子言说体用,从形上言,吸收佛教传统;从形下言,则继承中国固有之思想。但因为朱子坚持理为实理,故其从形上言之体用,也区别于佛教,而可吸收传统本根论的讲法。此外,无论从形上言还是形下言,朱子均坚持见在为体、发出为用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体用;形上;形下;见在;发出

中图分类号:B 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2-0024-08

“体用”是中国哲学重要范畴,在朱子哲学建构中亦占有重要位置。然而,朱子对体用的言说十分广泛,陈荣捷先生从“体用有别,体用不离,体用一源,自有体用,体用无定,同体异用”六个方面总结了朱子的体用说,进而认为,“朱子未尝著一有统系之体用论”①。果真如此吗?朱子对“体用”的言说是否可以通贯起来理解?朱子对体用的言说,是否有其内在一致性?这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朱子之体用思想颇为复杂,亦可反映理学家使用体用范畴之特色。如何全面理解朱子的体用论,涉及佛教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由此出发,回到朱子思想内部的形上与形下之别,可以通贯地理解朱子的体用思想。

一、两种体用说

中国思想史中的一段公案,颇能说明体用观念在中国思想中的复杂性,此一公案即李二曲与顾亭林关于体用来源的争论。李二曲认为“体用”二字出自佛书②,顾炎武则引“六经”之语,认为“体用二字既经传之所有”③。在李二曲看来,朱子言说体用实际上是受了佛教影响,尤其是受到慧能《坛经》的影响,顾亭林则坚持“体用”从中国自身思想传统而来,他特举《周易参同契》为例进行说明。④

争论体用之说从何而起,固然有意义,但这一争论其实提示出,在中国哲学史上,至少有两种体用观,一种是非佛教的、中国固有思想传统之体用论,一种是佛教思想中有的体用论。当然,这里需要做出一个区分,即“体用思维”与“体用概念”,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连用“体用”二字、明确体用对举,才有体用思想,不涉及这些字眼就没有体用思想。如若如此,则背后已经潜藏了某种体用观,而将其他思想排

收稿日期:2022-06-15

作者简介:赵金刚,男,河南安阳人,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熹理学中‘气’的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CZX028)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9 页。

② 李颙:《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148 页。

③ 李颙:《二曲集》,第 150 页。

④ 关于此一争论之概述,可以参见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8—15 页。

斥在体用思维之外。而恰是现代人哲学观念中的体用思维与体用概念在古代哲学那里有分离之处,才导致理解古代哲学思想时产生纠结。本文在较为宽泛的意涵上使用体用,更强调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体用思维。下面简要展示一下两种体用观的主要意涵,将之各自的特点展现出来,以便进而观察两种体用观对朱子的影响。

首先来看“非佛教的体用观”,这代表着佛教进入中国前中国思想传统的固有面向。张岱年先生特别注重揭示、发挥、解释这一面向。他指出:

> “体用”是唐宋以至明清的哲学著作中常用的范畴,其渊源亦在先秦时代。与“体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观念有“本用”“质用”。“本”亦称为“本根”“本体”。“本体”亦称为“实体”。从历史演变来看,“体用”似乎是由“本用”观念衍化而来的。到唐代,儒家佛家俱言体用,而其所谓体用的意义实不相同。①

张先生强调了儒佛两家言说体用之不同,而特别强调先秦的“本用”等观念作为中国传统体用思维的滥觞。② 张先生举了一些例子来对此种体用思想进行分析,较为突出的是:

> 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评述道家的学说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里以“本”与“用”对举。本是根本,用是根本原则的运用。《庄子·天下》篇述老聃关尹之学,有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本”与“物”对举。道家所讲的本即是虚无、无形的道。道家亦称本为“本根”,《庄子·知北游》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本根是以树木的根为喻,万物就如枝叶花果,必有其根。③

从张先生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固有思想的体用观认为,本与用都在一个世界,而非现象与现象背后的本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树木”的比喻,更展现出体和用的实在性、连续性。这种体用观,体一般指形体,而用则强调形体的功用。这就不存在本用之间哪个为真实、哪个为不真实的问题,而是对现实的、具体的实体作出分析、观察。本用可以有内外之别,但却不是实幻之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种体用观念下,本、质更多地强调“物质存在”“形质”,这种对“本”“体”的使用是最为常见的。兹举一例,《五行大义》言:

> 体者,以形质为名;性者,以功用为义。以五行体性,资益万物,故合而辨之。④

《五行大义》以“体性”这一观念表达“本用”或“体用”,这就说明体用思维不限于“体用”这一概念,而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则明确体是形体,用是功用。这可以说代表了非佛教的体用观的基本意涵。⑤

其次来看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对于体用的使用。

在将相关概念翻译为“体用”之前,佛教已经有明确的体用思维,在固定译法之前,也用别的概念表达这一思维模式,而六世纪初期则明确了这一范畴,但也不排斥使用其他概念表达这一范畴。如僧肇《般若无知论》中的“寂用”即是“体用”之义,“寂”指寂灭本性,“用”指认知功能。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中则有以“本用”指“体用”之处,可见梁武帝等在理解佛教体用思维时就已经参照了中国原有之“本用”观念。只不过这里的“本用”已经不再类似树木比喻,更多指根本与由这根本生起的效用,且二者并不在同一层次,同时,这样的“本”更加具有了佛教的特性,强调无明为本。《立神明成佛义记》及沈

---

①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岱年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页。

② 方克立先生于此观点与张岱年先生相同,他也强调不能限于言及“体用”二字来讨论体用范畴,要从先秦思想中寻找体用说的渊源。参见方克立:《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第188页。

③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第516页。

④ 萧吉撰,中村璋八校注:《五行大义校注》,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版,第7页。

⑤ 关于《五行大义》中的“体用观”,参见赵金刚:《体性与体用》,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十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136页。

绩注中下述论述,可以说是对佛教体用观的一个浓缩概括:

而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异用,无明心义不改。(臣绩曰:既有其体,便有其用。语用非体,论体非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将恐见其用异,便谓心随境灭。(臣绩曰:惑者迷其体用,故不断猜。何者?夫体之与用,不离不即。离体无用,故云不离;用义非体,故云不即。见其不离,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谓心随境灭也。)故继无明。①

这里认为一切现象的生命都根由无明之体,而这样的体本身是无所谓生灭的,但在逻辑上,有体必有用(体用不离),而体用又不能等同(体用不杂),体用是异质的。区别于非佛教的中国固有思想,形体等物质性存在不是“体”,体是神明、真理、佛性、精神主体、涅槃境界等,佛教特别强调“体空用有”,在这点上,佛教同中国固有思想有了根本差别。可以看到,佛教的体用观更接近今天一般人头脑中所理解的体用模式:体强调本质性的要素,用强调现象性的要素,此两者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体是第一性的,用是第二性的。

当然,区分出以上两种体用模式,是立足于中国思想史做的总体概括,概括出两种中国哲学体用说的基本模式。这里需要处理的一个“麻烦”则是魏晋玄学的体用模式,即玄学家对体用的使用究竟是哪种。按照汤用彤先生“本体论的突破”的讲法②,似乎玄学的体用观是佛教类型的,且早于佛教。但正如景海峰先生指出的,王弼的思想“并未完全摆脱《老子》‘道’生化之义的影响”,王弼“‘体’的用法还是大多承继了汉儒”③,在这个意义上,王弼依旧具有本根论倾向。此外,王弼不仅讲“以无为本”,还讲“以无为用”,白辉洪博士认为王弼没有佛教式的形而上学意谓的体用观念,他对相关概念的使用依旧没有超出早期思想史范围④。这是本文所认同的观点,也即玄学思想依旧在中国固有思想内容当中,与佛教的体用观是不同的。正是两种体用观的交锋、交织、交融,才使得体用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变得复杂,尤其是两种体用观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宋代新儒学当中,而这种复杂性最直接地展现在朱子身上。

二、形上看与形下看

理学对“体用”的论说首先要破除的是“空体”“无体”,而挺立一“实体”。其次,要建立体用的“直接性”,按照张载所讲,是要破除“体用殊绝”“形性不相资”。第三,则要承认“用”的意义。在体用的用法上,理学建立初期就有回到先秦的倾向,而对佛老思想有所“扬弃”。⑤ 理学之体用思想至二程、朱子而达到一高峰,而在朱子那里表现得尤为复杂。在朱子那里,体用既涉及哲学的阐发,也涉及学术的分判。我们重点来看哲学层面的论述。

首先,朱子坚持在“形体与功用”这个层面上使用体用范畴,这也是不少论者认为难解、不哲学的地方。如朱子⑥讲:

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又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故康节云:‘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车。’”问道之体用。曰:“假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

---

① 梁武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僧佑:《弘明集》,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册(No.2102),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4 页。

② 汤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全集》第 4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景海峰:《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第 57 页。

④ 白辉洪:《物之终始》,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18 年,第 164—165 页。

⑤ 具体用例参见张载:《正蒙·太和》,《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8 页。

⑥ 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1686、102 页。

> 天地是体,鬼神是用。鬼神是阴阳二气往来屈伸。
>
> 人只是合当做底便是体,人做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如尺与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铢,则体也;将去秤量物事,则用也。

上引第一条是理学史上讨论“理气先后”的重要材料,此处朱子主张理气的先后是理的“逻辑在先”①,按此,则理为形上,气为形下,理为体、气为用,但在后边朱子与弟子讨论“道之形体”与“道之体用”时,都没有如此言说。他首先强调“性”是“道之形体”,强调性可以在现实层面被把握。而当弟子询问“道之体”与“道之用”时,朱子所举之例更是与上引第三条接近,认为某种形体性的规定是体,而功能、功用、具体的应用则是用。顺着这个逻辑,似乎道体是某种具体的“形质”,这就与一般强调道体是形而上的表达不一致。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解释。对于上引第二条,朱子认为鬼神是“二气之良能”②,这里的天地显然是有实体性含义的世界总体,或直接就可看成是物质性意义的天地,而鬼神则是天地的功能与功用③。上述这些表达,朱子显然是继承中国固有思想对体用的一般用法。

其次,朱子也特别注重从形上形下、本体发用等角度言说体用,这种用法无疑与中国哲学对佛教的吸收关系密切,但在根底上,朱子则表现出与佛教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这些用法突出地表现在朱子对太极体用、理气、心性的阐发上,而被认为是最有哲学意涵的。如《太极解义》言:

> ○④,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 ,此○之动而阳、静而阴也。中○者,其本体也。 者,阳之动也,○之用所以行也; 者,阴之静也,○之体所以立也。⑤

在这里,太极是本体,阴阳是现象⑥,同时阴阳动静是太极本体之体用⑦,气的动静根据于理,太极/理是超越具体形象、形质的“形而上”者。陈来先生指出,“朱子解义最突出的一点, 就是明确把太极解释为‘本体’, 即把‘本体’作为道学形上学的最高范畴。……照朱子的解释, 太极是动静阴阳的本体, 此一本体乃是动静阴阳之所以然的根据和动力因。而这一作为本体的太极并不是离开阴阳的独立存在者, 它即阴阳而不杂乎阴阳”⑧。这里较为复杂的是,在概念使用上,朱子并不以太极为体,阴阳动静为用,但在思维模式上,却表现出人们一般所理解的体用思维。这其实也体现了朱子体用观的复杂之处,以及人们在理解朱子体用观时背后的观念纠结之处。以太极为本体,阴阳为现象,可以看出朱子言说与佛教体用思维的相似之处,即都强调体用不离、不杂,用根据于体,但不同于佛教,朱子并不主张“体空用有”,而是强调“体用皆有”。

在这个层面,朱子对体用的言说还有“性情体用”,即“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⑨,这与佛教的讲法既有类似也有区别:类似之处在于强调本体与发用之别,以之来讲各种心理现象;而区别则在于朱子

---

①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12 页。

②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395 页。

③ 参见赵金刚:《朱子论“二气之良能”》,《中州学刊》2017 年第 11 期,第 115 页。

④ ○,代表太极。

⑤ 朱熹:《太极图说解》,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0 页。

⑥ 蒙培元不认为朱子讲的理事/理气体用关系是西方哲学意涵上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而依旧是本体与功能、作用的关系(参见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0 页)。这涉及如何理解本体与现象,可以说朱子思想中的本体与现象不是截然二分的、对立的,但如果从形上、形下的区分来讲,将理气关系理解为本体与现象亦可。

⑦ 参见陈睿超:《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哲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68 页。

⑧ 陈来:《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哲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41 页。

⑨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2823 页。

拒绝有本体的心和发用的心的区分,体用是在性情上讲,而心统性情,心是一个心①;此外,作为体的“性”在朱子那里不是佛教似的“空”,而是理的现实化,含有具体的内容。

第三,上述两个层次,以往学者多有指出,但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二重在朱子那里有时并不是完全可以拆开,朱子言说体用经常有将上述一、二两点综合起来使用的地方,这就更加显示出朱子言说体用的复杂之处。如上引《太极解义》特别强调阳之动是“太极之用所以行也”,阴之静是“太极之体所以立也”,主张“阳动可以见太极之用的流行,阴静可以显示太极之体的定立”,②也即是作为本体层面的太极,其贞立也会显示为阴静的形质状态,这一方面说明太极本体不离具体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朱子即使在言说上述第二层面的体用时,依旧有保留第一层面的倾向③,本体会有一个凝成、确定、具体的“太极之静”的状态以呈现生理的根源④。在讨论心性问题时,亦存在类似的现象。如《语类》言:

> 爱是仁之发,谓爱是仁,却不得。论性,则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弟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里面事。⑤

这里明显存在本末、体用两组概念的交织,而朱子似乎并未将它们区别开来,而是很自然地在一个问题中使用:仁是性,爱/孝悌是情,在这个意涵上,可以讲第二个层面的体用;同样的,仁是孝悌实践的根本,根本既立,则会有孝悌的实践自然展开,在这个意涵上可以讲本末、本用。但这是否和第一点讲的体/本含有形质的意思相矛盾呢? 还仅仅是比喻意上的使用? 我们将在第三部分做出具体阐释。

通过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朱子体用观的复杂性,上面的分析似乎坐实了学者认为的朱子言说体用无定、无系统,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朱子言说体用的视角,并由之出发,则可以找到朱子言说的融贯之处。陈来先生在晚近的朱子哲学研究中特别提示观察朱子思想应该特别注意朱子言说的视角:

> 对于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说,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⑥

也即是对同一问题、范畴、思维,朱子站在不同的言说角度,他会有不同的表达,朱子言说的差异,往往是由于言说视角的转换造成的,有时朱子明确地指出并区分了言说视角,有时则同时包含不同视角且未区分,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朱子思想时将之明确出来。观察朱子的体用观,也需要注意朱子言说体用时的视角。从朱子思想出发,可以发现朱子言说体用有两个视角,即从形上言说和从形下言说。理学严分形上、形下,也带来了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程颐《程氏易传》“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一句被认为是理学体用观的典型叙述,在解释这一思想时,朱子在《答何叔京》中讲:“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⑦ 这里明确区分出“自理而观”和“自象而观”:自理而观,也就是站在形上的视角,那么理是体,象是用,但理中已经包含了象的发用,从理而观,对应上文所讲的第二层面,与佛教言说在思维上接近;自象而观,也就是站在形下的视角,站在现实存在的层面,那么象作为有形质的存在,可以展现出理的规定要求,在这个意义上,

① 参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0 页。
② 陈来:《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哲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第 42 页。
③ 陈睿超在《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本文需要强调的是,朱子除了在第一层面上直接保留形质论传统外,在言说本体与现象问题时,亦对此有所保留。
④ 李健芸:《〈延平答问〉与朱子哲学的展开》,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22 年,第 73 页。
⑤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2869 页。
⑥ 陈来:《朱子四德说续论》,《中华文史论丛》2011 年第 4 期,第 50 页。
⑦ 《朱子全书》第 22 册,第 1841 页。

可以对应第一个层面,也就是从形体与功用言说体用。在《答吕子约》中,朱子说的更为明确:“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①这就更明确地指出,在形下层面上,事物是体,而根据于理有的功用是用——事物的具体功能、实践等,在朱子那里均是根于理而有。当然,从形下言,具体的事物是合理与气为一的现成存在,是理气的统一体,从这个角度叫“其理之发见”就更加顺畅。

在《太极解义 · 附辩》中,朱子同样以这样的视角言说体用,并将周子之说与程子之说结合:

>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②

这同样是从两个视角言说体用问题,并将之明确区分开来。这些都说明,朱子对于体用的言说,是有明确的视角问题的,只有区分出看待体用的视角,才可以进一步理解朱子的体用观。总体上,朱子从形下言说体用,继承的是非佛教的中国固有之传统,从形上说体用,则与佛教多有呼应,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受到佛教影响后的体现。但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受佛教影响,却并未彻底走向佛教,在保留中国固有传统的同时,他们通过儒家思想的再阐发,反而将佛教思维安顿在儒家价值之下——这也是朱子保留中国固有传统的重要理论意义。

三、见在为体,生底为用

以上我们区分了朱子言说体用的两个视角,并将之对应于体用言说的不同传统。透过以上两种视角不能说朱子言说体用“无定”,反而可以顺此思路更进一步,发现朱子言说体用的融贯性。

《语类》中的一段话,颇能反映朱子体用观视角与融贯的关系:

> 问:“前夜说体、用无定所,是随处说如此。若合万事为一大体、用,则如何?”曰:“体、用也定。见在底便是体,后来生底便是用。此身是体,动作处便是用。天是体,‘万物资始’处便是用。地是体,‘万物资生’处便是用。就阳言,则阳是体,阴是用;就阴言,则阴是体,阳是用。”③

“随处说”的“无定”展现了视角转换对于体用关系的影响。而朱子之后强调的“体用也定”并不只适用于将世界看成一个总体。体用之“定”在朱子这里表现为“见在底便是体,后来生底便是用”,“见在”强调现成性、确定性,“后来生”强调派生性、可能性。这里更为重要的是,朱子依旧强调视角转换对于体用言说的变化,但在他看来,无论哪种视角,都需要遵循“见在底便是体,后来生底便是用”这一基本规定。无论从形上看还是从形下看,均是如此。从形上看,可以区分出逻辑的见在与发用,从形下看,则区分为实际存在的见在与发用。在前引《答吕子约》中,朱子就贯穿着这样的判断:形上言,理“见在”优先,而“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形下言,事物具有具体的形质,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

有时朱子用“用即是体中流出也”表达同样的意思。《语类》言:

> 文振说“樊迟问仁,曰:‘爱人’”一节。先生曰:“爱人、知人,是仁、知之用。圣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迟,却不告之以仁、知之体?”文振云:“圣人说用,则体在其中。”曰:“固是。盖寻这用,便可以知其体,盖用即是体中流出也。”④

---

① 《朱子全书》第 22 册,第 2226 页。
② 朱熹:《太极图说解》,第 78 页。
③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101 页。
④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1095 页。

“流出”即是从现成性、确定性中派生为可能性。当然按照形上看、形下看的视角,依旧可以分为逻辑的流出与实际的流出。杨立华教授认为,朱子的“体用”的用法至少存在三种可能:以可能性为体、可能性的具体实现为用;以应然性为体、应然性的具体落实为用;以现在的为体、后来生的为用①。前两种说法其实都内在于从形上看,此外加上从形下看,则能较为完整地概括朱子的体用用法。而形上与形下这些视角,是观察角度,“见在为体,生底为用”则是不同角度下共通的判断标准。

当然还可进一步追问,为何从形上看与形下看都可以遵循“见在为体,生底为用”,朱子的“两重体用”何以能够以之融贯?“两重体用”在朱子那里缘何不矛盾?这就需要再将视角转回对从形上看的分析,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朱子所讲的理是实理、体是实体,都是区别于佛教所讲的“空”的有内容的存在。理学自建立以来就强调最高范畴“理”的“实有”,如程颐讲“天下无实于理者”②,朱子亦讲“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至无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以目击而指数也”③,理虽然是无形无象的形而上者,但无形无象并不意味着理是无内容的“空无”“虚无”“无规定性”,理是具体的抽象,而不是空无的抽象,朱子所讲的理是“理一自有分殊”“一理而含五理”④,以纯粹至善作为具体内容。这样的理是“无体之体”,既是客观的实在,又是永恒的存在,也是变化的根源,这自然区别于佛老所讲的“本体”。

朱子既强调理气不离,但又讲理气不杂,特别强调理在逻辑上优先于气,“实理”相对于“气”是绝对优先的“见在”,而这在体用观上就表现为上述从形上看体用模式。陈荣捷先生讲“朱子每言‘实理’‘常理’。理非空虚之物,必有实现,所谓实理也”⑤,实理的必有实现,就是从形上看的体用的根本。从形上的角度看,实理方才是体,实理不是空理、无理,实理中自有段子,“理一”不是空洞的“理一”,而是有具体内容的“理一”,理当中含有了具体的差别性(“万象森然已具”),并一定会具体地实现为这样的差别性。而由于理是实理,且在朱子思想当中可以容纳非物质性生成观的“理生气”,气相对于理是“生底”“流出”的,这样在形上看的体用模式下,又可以兼容“形体—功用”的体用模式,在理是生物的根本这一维度下,可以讲本末。回到上引“爱是仁之发”一条,正是由于仁是实理,才带出仁的“形体”意谓,故可以有爱、孝悌的功用,同时当然也可以说由仁之性理发为爱、孝悌之情。

从现实的角度看,有理必有气、有气必有理,“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⑥,万事万物都是合理与气而成的真实存在(形下之“见在”),一切的具体存在的气中都包含着理作为规定性,而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理也必然要通过气来实现其规定(形下之“生底”“流出”),这就是形下看的体用的根本。而由于任何形下的功用都可归于气的动静,气的动静又是根于理,如是形下看的体用模式又不离形上看的体用模式。可见,朱子的“两重”体用可以融贯在一起,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也不能认为朱子所讲含有内在矛盾,更不能以形上看的所谓哲学意涵否定“形体-功用”的体用说。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很有可能是朱子用本根的模式去收摄“本体-发用”的模式,朱子思想并非仅仅是保留了“形质论”体用传统,而是在形质论的基础上,以至实之理为基础,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模式。本根论视角在今天某些论者看来不那么哲学、较为素朴,但这或许才是朱子的根底,而由于对实理的特别阐发,朱子在哲学上又丰富了本根论,丰富了儒家哲学的思想深度,但又不至于牺牲儒家哲学的基本特质。

概言之,朱子思想中的“体用”论述,在吸收了前代各种思想的基础上,成为其理学的重要思维模

---

① 杨立华:《体用与阴阳:朱子〈太极图说解〉的本体论建构》,《哲学研究》2012 年第 10 期,第 67 页。

② 程颐、程颢:《二程集》,第 66 页。

③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 232 页。

④ 参见赵金刚:《从历史观出发看朱子的“理一分殊”》,《江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第 27—28 页。

⑤ 陈荣捷:《朱熹》,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年版,第 47 页。

⑥ 《朱子全书》第 13 册,第 117 页。

式。正是由于从形上言的体是实理,从形下言的体是实物,体用皆“实”,“实理”之体必然会发用为现实,“实物”之体必然会有“功用”,形上、形下之体用模式皆遵循见在为体、生底为用的基本规定。在此基础上,朱子关于体用的各种论述,都可以在此框架中得到合理的安顿,朱子体用思想内在的逻辑性与清晰性也得以彰显。朱子关于体用的各种用法,并非像有些论者所言的那样没有系统,而是具有其逻辑的内在统一性。为了强调朱子“体用”思想的一贯性,也不需要将某些朴素的描述剔除在“哲学”的分析之外。朱子的体用观根本区别于佛老,我们不能因为朱子思想有吸收佛教的地方,就认为朱子的体用观完全是佛教模式的,朱子恰是在吸收佛教体用观的同时,在根本上坚持了儒家立场。如是,方始将中国固有之体用思想与佛教之体用思想融通为一,发展出一套全新的体用模式。

Substantial Reason, Found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A Reflection on Zhu Xi's View of Foundation & its Application

Zhao Jing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100089, *China*)

Abstract: Foundation & its application (体用)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stinctive catego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have been full of controversy since ancient times. Zhu Xi's (朱熹) thought on foundation & its application was very complex, which can also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Neo-Confucianists in using the category of found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How to fully understand Zhu Xi's theory on foundation & its application involves Buddhist tradition and China's inherent ideological tradition. Starting from this point, we can retur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bove form (形上) and within form (形下) inside Zhu Xi's thought, thus getting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his thought on foundation & its application. Speaking of found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Zhu Xi absorbed Buddhist tradition in terms of above form, and inherited China's inherent thoughts in terms of within form. However, as Zhu Xi insisted that reason (理) should be substantial reason (实理), his thought on found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erms of above form differed from Buddhism, and he could manage to absorb the teaching of the traditional root theory (本根论). In addition, Zhu Xi insisted on his basic view that what is present (见在) is the foundation while what is presented (发出) is its application, no matter whether it was in terms of above form or within form.

Key words: foundation & application (体用); above form (形上); within form (形下); what is present (见在); what is presented (发出)

(责任编辑 郭昌盛)